

姜广辉 主编

中国经学思想史

第四卷

下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姜广辉 主编

中国经学思想史

四卷
● 下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目 录

清代经学

第八十一章 解构与重构:走向近代的经典诠释

——清代经学思想演变历程的三个阶段…………… (3)

- 一 清代初期对理学的总结与批判思潮…………… (7)
- 二 清代中期的经典考据学思潮…………… (19)
- 三 清代后期的春秋公羊学思潮…………… (35)

第八十二章 士风流变与经典尊黜

——陈确对《大学》一书的批判…………… (48)

- 一 《大学》经学地位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…………… (49)
- 二 《大学》文本及其诠释取向…………… (54)
- 三 陈确对《大学》的批判…………… (60)

第八十三章 王夫之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经学思想…………… (66)

- 一 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提出…………… (67)

二 《周易外传》的道器观	(70)
三 《尚书引义》的能所观和知行观	(76)
四 《读四书大全说》的理气、理欲观	(83)
五 《春秋家说》的民族观	(87)
第八十四章 清初学者对宋儒图书易学的批判	(92)
一 黄宗羲的《易学象数论》	(93)
二 黄宗炎的《图学辨惑》	(104)
三 毛奇龄对宋儒图书之学的考辨	(111)
四 胡渭的《易图明辨》	(117)
第八十五章 李光地与《周易折中》	(124)
一 折中于朱熹	(127)
二 准天之道,推生民之用	(130)
三 穷理尽性至命	(138)
四 君臣交以实心	(142)
五 养贤以及万民	(147)
第八十六章 顾炎武:清代经典考据学的先行者	(150)
一 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	(151)
二 “经学即理学”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	(155)
三 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	(159)
四 顾炎武的古音韵研究	(165)
第八十七章 阎若璩与《古文尚书》公案	(173)
一 阎若璩曾大量抄袭梅鹭《尚书考异》吗?	(174)
二 《尚书古文疏证》找到了《古文尚书》辨伪的关键点	(181)

三 阎氏定的“铁案”还能再翻过来吗?	(195)
第八十八章 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的疑古精神	(209)
一 生平与学术	(209)
二 对前人解《诗》的疑古态度	(211)
三 对《诗经》的诠释原则	(228)
四 对近代疑古派的影响	(246)
第八十九章 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历史原因	(250)
一 关于“乾嘉考据学”的成因问题	(251)
二 关于乾嘉时期的“学派”问题	(263)
三 明清考据学的四个发展阶段	(265)
第九十章 惠栋:标帜“汉学”的吴派宗师	(271)
一 重新强调汉儒家法,亦重视贯通诸家家法	(273)
二 勤于考证,信而好古	
——以《古文尚书考》为主要评析对象	(284)
三 批判宋明理学	(295)
四 汲取西学	(300)
第九十一章 戴震:学主“求是”的皖派领袖	(304)
一 戴震的生活环境及其学术思想的形成	(305)
二 “由字以通其词,由词以通其道”的治经方法	(312)
三 见“道”之作:《孟子字义疏证》	(317)
四 戴震的治经成绩	(323)
五 从戴学的接受史看戴震经学思想的意义	(333)

第九十二章 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的思想 ·····	(344)
一 “六经皆史”：“经”的“还原”·····	(347)
二 从“史”到“经”：“经”的演生·····	(353)
三 实践意识：“经”与“经世”·····	(357)
四 “六经皆史”与“六史为经”·····	(362)
第九十三章 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评述 ·····	(372)
一 洪亮吉入朱筠幕府之后的学术转向·····	(373)
二 洪亮吉的《春秋左传诂》·····	(376)
第九十四章 倡复古典礼学的凌廷堪 ·····	(398)
一 凌廷堪礼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·····	(399)
二 凌廷堪礼学研究的方法与观点·····	(404)
第九十五章 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·····	(416)
一 考据不是经学·····	(417)
二 “实测”与贯通 ——以易学的“旁通说”为主要评析对象·····	(425)
三 “惟经学可以言性灵”·····	(431)
第九十六章 乾嘉汉学的殿军——阮元 ·····	(439)
一 阮元的经典诠释思想·····	(440)
二 阮元的经典版本校勘学思想·····	(454)
第九十七章 庄存与：清代公羊学的发轫者 ——兼论孔广森的《公羊通义》·····	(463)
一 从《春秋属辞》到《春秋正辞》·····	(464)

二	上接董、何,阐明《春秋》大义·····	(468)
三	“章疑别微,《春秋》之大教也”·····	(477)
四	善说《春秋》者,贵“知权”,戒“执一”·····	(483)
五	孔广森自立“三科九旨”的失误·····	(488)
六	孔广森《公羊通义》的评价问题·····	(496)
第九十八章 刘逢禄与清代公羊学的发皇壮大		
	——附论凌曙和陈立·····	(503)
一	公羊家法与今文学复兴之统绪·····	(503)
二	内部开掘和外部廓清之功·····	(506)
三	阐发“张三世”,传达时代变动的信息·····	(508)
四	阐发“通三统”,论治国“穷则必变”之道·····	(515)
五	阐发“王鲁”、“黜周”,论“大一统”思想的意义·····	(519)
六	继往开来,壮大公羊学派的力量·····	(525)
七	从凌曙和陈立反观清代公羊学复兴之艰辛历程·····	(532)
第九十九章 龚自珍与晚清经学的嬗变·····		
一	“衰世”之音与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·····	(545)
二	青年龚自珍对晚清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·····	(550)
三	探讨上古文明起源之阶段演进·····	(558)
四	《春秋决事比答问》对《春秋》大义的阐发·····	(563)
五	有关古文经学的看法·····	(571)
第一〇〇章 魏源的今文经学与晚清思想解放·····		
一	《诗古微》推进学术风气革新的价值·····	(578)
二	《书古微》以新的视角论述学术史变迁·····	(588)
三	追求社会改革的思想·····	(594)

四 倡导向西方寻找真理·····	(599)
五 龚自珍、魏源今文经学的历史地位·····	(604)
第一〇一章 马瑞辰治《诗经》之立意与方法·····	(613)
一 马瑞辰诗经学的基本理路·····	(614)
二 复圣人之志的治经立意·····	(617)
三 译圣人之意的治经方法·····	(623)
四 对《毛诗传笺通释》的总体评价·····	(630)
第一〇二章 “调和汉宋”的经学思想家:陈澧·····	(636)
一 陈澧经学观的演变·····	(637)
二 义理与考据并重·····	(642)
三 解经之法与读经之法·····	(651)
四 会通汉宋 回归孔孟·····	(664)
第一〇三章 清后期的春秋谷梁学·····	(679)
一 钟文烝《春秋谷梁经传补注》的经学思想·····	(680)
二 廖平《谷梁古义疏》的思想·····	(693)
三 江慎中会通中学西学的《春秋谷梁传条指》·····	(705)
第一〇四章 廖平的“经学六变”及意义·····	(729)
一 早年的两次思想转变·····	(730)
二 “经学六变”的时间与变因·····	(734)
三 廖平在经学史研究上的成就·····	(741)
四 廖平的尊孔尊经理论·····	(755)
五 对廖平“经学六变”的评价·····	(763)

第一〇五章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变法思想 ·····	(769)
一 今文经学思想的确立·····	(770)
二 “托古改制”之“通三统”·····	(781)
三 “与时进化”之“张三世”·····	(789)
四 “大同世界”之“大一统”·····	(802)
五 儒学向近代转化的尝试·····	(812)
第一〇六章 皮锡瑞的今文经学思想 ·····	(826)
一 生平与著述大要·····	(827)
二 “通经所以致用”·····	(835)
三 “尊孔必先明经”·····	(839)
四 “治经必宗汉学”·····	(844)
五 “义理必兼考证”·····	(847)
六 “学求心得,勿争门户”·····	(851)
结语 儒家经学中的十二大价值观念	
——中国经典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解读·····	(862)
一 从哲学层面来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·····	(864)
二 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·····	(868)
三 从家庭、社会观念来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·····	(873)
四 从国家、邦族、天下层面来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·····	(878)
后记 ·····	(888)

第九十七章

庄存与：清代公羊学的发轫者

——兼论孔广森的《公羊通义》

当清代乾隆时期经典考据学渐入鼎盛阶段，有一位常州籍的学者庄存与，他曾做过皇子的师傅，年纪较戴震为长，但当时的学术名气却远不如戴震大。庄氏著有《春秋正辞》，这是一部研究春秋公羊学的著作。这部书的撰著或许有意与考据学对峙。考据学家主张“由字以通其词，由词以通其道”，以为是治经的不二法门。而公羊学家主张从《春秋》中寻求圣人的“微言大义”，而圣人的“微言大义”往往在经典文字之外，此即所谓“于所书求所不书”。此外，考据学家为考据而考据，脱离现实政治，这就使得儒者的价值关怀和政治理念难以落实。庄存与生前其学不显。后来其侄庄述祖、孙庄绶甲、外孙刘逢禄和宋翔凤继起弘扬公羊学，常州学派遂崛起于学林。庄存与亦被尊为常州学派的开派宗师。

庄存与（公元一七一九～一七八八年），字方耕，江苏武进人。乾隆十年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后任直隶学政、礼部右侍郎等官职，乾隆三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，为皇子师傅，与谢墉、金性和刘星炜等四人同称为“乾隆中直上书房诸臣以学行称者”。^[1]他所著《春秋正辞》直接受到元代赵沍《春秋属辞》的影

响，成为清代公羊学的发轫之作。庄氏关于公羊学的著作，还有《春秋举例》、《春秋要旨》，另外又有仍主古文经传之说的著作《周官记》、《周官说》、《毛诗说》。关于其学术的评价，《清儒学案》谓：“生平践履笃实，于六经皆能阐发奥旨，不专事笺注，而独得先圣微言于语言文字之外。”^[2]魏源则称他的学术特点是：“萃乎董胶西之对天人，醺乎匡丞相之述道德，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，未尝支离辄析。”^[3]所评即是对一代宗师的褒扬。

一 从《春秋属辞》到《春秋正辞》

东汉以后，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社会结构已趋于稳定，主张“尊古”、倾向保守的古文经学更适合于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指导思想，势必取代主张“改制”、“变易”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。郑玄遍注群经，主古文家说而兼采今文，实际上把今文家说统一于古文之中。于是古文学说盛行，以公羊学为主体的今文经学派，遂从西汉的显学地位一下子跌入谷底。自东汉末至清中叶长达一千六百余年，公羊学几乎无人问津。从东汉末年起，至清代乾隆年间庄存与著书重新提起公羊学说，中间经过一千六百余年的消沉，今文学“湮灭殆尽”了。

在此一千多年间能响应公羊学说哲理者，诚为空谷足音。唐代文学家、思想家韩愈注意到公羊学说含有深刻的哲理，在其《原道》这篇名文中，韩愈引用公羊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智的观点：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^[4]当时，殷侗有志于撰一部《公羊传》的注疏，韩愈深感在公羊学说几绝、要妙之义无人寻绎的情况下，这种志向大可嘉许，于是致书鼓励，愿意为他写序，信中说：“况近世公羊学几绝，何氏注外，不见他书。圣经贤传，屏而不省；要妙之义，无自而寻。非先生好之乐之，味于众人之所不味，务张而明之，

其孰能勤勤缙缙若此之至？固鄙心之所最急者，如遂蒙开释，章分句断，其心晓然。直使序所注，挂名经端，自托不腐，其又奚辞？”^[5]可惜殷侑对公羊学的见解无从得见，其书成否也未能知晓。由于公羊学说长久被冷落，故像明清之际顾炎武这样渊博的学者，也对公羊学说无所了解，他从古文学派的立场，认为何休对“三世异辞”的解释，既费事，又不通，“甚难而实非”。^[6]只有元末明初学者赵汭著有《春秋属辞》，与公羊家法关系密切，而成为清代学者庄存与著书的直接先导。

赵汭以二十年的精力著成《春秋属辞》十五卷，其意图是，不满意当时学者只据《左传》解释《春秋》，认为“《春秋》截断鲁史，有笔有削，以寓其拨乱之权，与述而不作者事异”。^[7]故认识到《公羊传》重视《春秋》的“义”是对的，他不用推阐“微言大义”的方法，而通过考证“属辞比事”，来推求《春秋》之旨。宋濂为赵书作序，批评前人解《春秋》之失云：“其所蔽者，《左氏》则以史法为经文之书法，《公》、《谷》虽详以经义，而不知有史例之当言，是以两失焉尔。……有能会而通之，区以别之，则《春秋》之义昭若日月矣。”^[8]宋濂的话，实即称赞赵汭运用了探求经义和归纳史例二者会通的方法，可谓深得赵汭二十年著书之苦心。

赵汭采取按照《春秋》属辞归类、求得义例的方法，将全书分为八篇：第一，存策书之大体；第二，假笔削以行权；第三，变文以示其义；第四，辩名实之际；第五，谨中外之辩（辨）；第六，特笔以正名；第七，因日月以明类；第八，辞从主人。

其中，第一至第六是主要部分。因为，据作者的认识，“自《左氏》不知有笔削之旨，为公羊学者遂以《春秋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，通修一代之史者，于是褒贬之说盛行。又有以为有贬无褒者，又有以为一经所书皆为非常，而常事之书者，有谓‘黜周王鲁’者，有谓‘用夏变周’者。其失在不知存策书之大体之

义而已”。^[9]又说：“圣人拨乱以经世，而国书有定体，非假笔削无以寄文”，因而应该注重“假笔削以行权”。“然事有非常，情有特异，虽笔削有不足以尽其义者，于是有变文，有特笔。而变文又特为类者，曰辩名实，曰谨中外。”故又应该注重“变文以示其义”、“特笔以正名”。^[10]

显然赵汭不赞成公羊学家探究《春秋》的褒贬，反对“王鲁黜周”一类命题，以为这样就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掩盖了公羊学的主旨。《春秋》一书记载简略，若欲从中归纳出整齐有法的“例”，必然此通而彼碍，陷于支离破碎的地步，故董仲舒已有言之，“《春秋》无达例”，实已告诉人们此路不通。赵汭为求《春秋》的例，烦琐不得要领，结果《春秋》的义，晦而不明。他列“存策书之大体”共七卷，一百二十一目，读之使人感到主次难辨。他所列举的例目，有：

嗣君逾年即位，书元年王正月，公即位。不行即位礼，不书即位。告朔朝正，书王正月。

即位不在正月，故不书正月。

岁首必书王月。无系月之事，不书正月。

一时无事，书首月。

事之系日者，遇晦朔则书晦朔。

公母弟卒书弟书字。

诸如此类。像这样归纳出来的“例”，实在对理解《春秋》拨乱反正的“大义”无甚帮助。但是，在东汉以后公羊学沉寂千余年中，赵汭著成这部《春秋属辞》还是有价值的。我们也许可以说，此书为公羊学说保留了一团火种。因赵氏在书中肯定《公羊传》得“学《春秋》之要”，从而启发后人推寻公羊学的真义。

赵汭根据自己的理解，认为孔子修《春秋》确有寓拨乱之大

义，而这种精深的义旨无法直接用文字表达，那么其方法就是如司马迁所强调的笔削功夫，尤其要重视“不书”之处，将它拿来与所“书”之处相比较，便可以从中学会孔子的真义，《春秋属辞》卷二《假笔削以行权》序中即申述此意云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寓其拨乱之志，而国史有恒体，无辞可以寄文。于是有书，有不书，以互显其义。其所书者则笔之，不书者则削之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论孔子为‘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’，正谓此也。……而夫子于《春秋》独有‘知我罪我’之言，亦以其假笔削以寓拨乱之权，事与删《诗》定《书》异也。自《左氏》不明此义，其徒遂不知圣人有不书之法。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每设不书之问，盖其所承犹得学《春秋》之要，而无所考据，不能推见全经。”赵沅讲《春秋》一书乃孔子假笔削以寓褒贬之权，并认为《公羊传》得学《春秋》之要，这在千余年的沉寂中显属难得，提醒人们记住《春秋》中寓含圣人笔削的大义，并称《左氏》“不明此义”。这就对后人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，而不再一味盲目因袭古文学派的成说。赵氏书中《特笔正名第六》对《春秋》的“特笔”区分甚详，有：“讳会天王以王狩书”；“嗣君出奔复归称世子”；“以庶孽易嫡嗣未逾年见弑，称杀其君之子”；“诸侯灭吾同宗之国称名”等。这样做也在客观上引导后人去推究《春秋》之义。总之，赵沅《春秋属辞》虽未能求得《春秋》拨乱反正大义之所在，但因为赵沅志在推寻《春秋》之旨，并认为《公羊传》比《左传》在“学《春秋》之要”上做得更好，这就启发后代有识之士继续去做更有价值的探究。

庄存与所著《春秋正辞》，既是从赵沅之作受到启发，同时又具有拉开清代公羊学序幕的重要意义。他公开举起旗帜，要尊汉代董仲舒、何休今文学家之“古”，求公羊学之正途。由于他的成就，一下子打破了千余年公羊学的沉寂，接续了西汉董仲舒和东汉何休的公羊学说统绪，使这一独特的古代儒家学说重获新

生。他的著作，为清代公羊学开辟了得以进一步开疆拓土的基地。

《春秋正辞》共十三卷。庄存与开宗明义，宣布自己不同于赵沅的主张：^[11]

存与读赵先生《春秋属辞》而善之，辄不自量为隐括其条，正列其义，更名曰“正辞”，备遗忘也。以尊圣尚贤，信古而不乱，或庶几焉。

由赵沅的《春秋属辞》到庄氏的《春秋正辞》，一字之差，实际包含着性质上的重大变化。在阐释《公羊传》的标准上，他明显推尊董仲舒、何休，这即其“尚贤”的含义，故庄氏所说的“信古”，实则指信两汉今文学派家法之“古”。他依照这一标准去求《春秋》辞句中所蕴含的正确的义理。

二 上接董、何，阐明《春秋》大义

庄存与的学术影响了其从子述祖、孙绶甲、外孙宋翔凤和刘逢禄，他们皆喜谈公羊学说，形成清代著名的常州学派，其中刘逢禄尤能传其学。但在当时，倡导讲求“微言大义”的公羊学，与当时盛行的训诂考证学风正相异趣，故他有关公羊学的著作长时间不被学者所重视，魏源对此曾发出慨叹：庄氏的公羊学著作，“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”。魏源又表彰庄氏具有因权奸当道而忧心国事的志操：“君在乾隆末，与大学士和珅同朝，郁郁不合，故于《诗》、《易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，往往发愤慷慨，流连太息，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。”^[12]庄氏这种耿直的性格反映在学术上，便是重视特识真见和开创新学派的风格。

（一）解释“书法”和探究“微言大义”的不同

上文说到，赵沅《春秋属辞》是在长期湮灭无闻之中为公羊学说保存了“火种”。然而他的书对《春秋》义旨的总结又属于比较表层的，未能进入到公羊学的深层意义。我们比较赵沅和庄存与两人对隐公元年即位与否的不同解释，即可明了庄氏学术旨趣的特色。

赵沅《春秋属辞》首条提出：“嗣君逾年即位，书‘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’；不行即位礼，不书‘即位’；告朔朝正，书‘王正月’。”这一义例，是他从“隐公元年春王正月”至“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”，见于《春秋》中十一条记载归纳得出的。赵沅认为：鲁桓、文、宣、成、襄、昭、哀八个国君，都是第一年嗣子继位，“逾年正月朔日，乃见谒庙，以明继祖，还就阼阶之位，见百官，以正君臣”。国史因书“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”；而隐、庄、闵、僖四君元年，都仅书“元年，春王正月”，不书即位。赵氏认为这些都有特殊原因，如“隐公摄君位，不行即位礼”。^[13]

按赵氏所说，隐公元年首条的记载，只是据鲁史而来，毫无深切微妙之义旨。然则，按庄存与的解释，这一记载却包含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他说，《春秋》这样书法，不是隐公未尝践位、行礼，而是“践其位，行其礼，然后称元年。君之始年，非他人，隐公也”。进而说，这样书法，是表示隐公只摄相位，以将来让位于其弟桓公。可是，桓公后来弑其兄隐公，是大恶的行为，恰是隐公助长他的。所以隐公这种让恰恰应受到谴责。他由此得出一条原则：“《春秋》之志，天伦重矣，父命尊矣。让国诚，则循天理、承父命。不诚矣，虽行即位之事，若无事焉，是以不书即位也。君位，国之本也。南面者无君国之心，北面者有二君之志，位又焉在矣！十年无正（按，指自隐公二年至十一年，《春

秋》经文中均无‘正月’字样) 隐不自正, 国以无正也。元年有正, 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, 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!”^[14]

庄存与这样解释,《春秋》中首条的书法, 包含有国君应遵从天理、父命, 庄严治国之意, 讥评鲁隐公却未能依此而行。显然赵沅《春秋属辞》和庄存与《春秋正辞》同为治公羊学之书, 实则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: 前者只着重从书法和义例上作解释; 后者则有志于探究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义”。

(二) “奉天子”和“宗文王”

庄氏《春秋正辞》全书分为奉天辞、天子辞、内辞、二伯辞、诸夏辞、外辞、禁暴辞、诛乱辞、传疑辞九类, 是按庄氏所理解的公羊家的观点, 将《春秋经》重要的文辞按类归纳, 逐条作出自己的阐释。

庄氏所尊列为第一位的“奉天”, 实则是“奉天子”。这是庄存与对公羊学说的重要诠释, 把汉代形成的公羊学理论体系中尊奉王室、强调国君是受天命而治这一核心观点凸显出来, 这对预示清代公羊学将走上政治性、以经论政的道路关系至大。庄氏解释“元年春王正月”中元、春、王、正月、即位五项一同出现, 是代表了王承天而治、诸侯上奉王政这一套最根本、最重要的意义。因而称之为“建五始”, 作为“奉天辞”的第一项。他重申何休所说: “政莫大于正。故《春秋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, 以天之端正王之政, 以王之政正诸侯即位, 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。……五者同日并建, 相须成体, 乃天人之大本, 万物之所系, 不可不察也。”^[15] 且又引述董仲舒《天人三策》所言人君依天意行事, 以正朝廷百官, 统率万民, 四方之内正气充旺, 邪气荡清, 达到风调雨顺, 万民协和, 五谷丰登, 草木茂盛, 四海太平的境地, 王道得到完美的实现这番话。这就有力地证明, 庄氏的公羊学著作是以董仲舒、何休的学说为根本出发点, 利用公羊